

绪论 开发与保护：四川酒文化资源管理研究

酒 是各种含淀粉或者含糖的物质经过自然发酵过后形成的一种特殊饮料。之所以说酒比较特殊，根本原因就是酒含有酸、酯、醛、醇等各种化学成分，其中主要化学成分乙醇不需要经过消化系统就可以直接被肠胃吸收。酒在进入人体后，首先是通过血液进入肝脏，在肝脏过滤后，又到达心脏，再到肺，从肺又返回到心脏，然后通过主动脉到静脉，再到达大脑和高级神经中枢，这就可以对饮酒人的生理和心理都产生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使得饮酒人对酒产生一种依赖，从而使得饮酒人喜欢饮酒。并且酒对于人的神经中枢的刺激作用，也使得人的血液循环加快。酒在有些时候能够促使人的才能更加神奇地发挥，从而产生了很多艺术品和诗歌，产生了各种丰富的酒文化。

酒文化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文化。酒自产生以来，就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就体现在中国传统思想所主张的修身养性等各种问题上，也体现了古人对善恶的判断标准。《说文解字》解释：“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清代段玉裁注：“宾主百拜者，酒也。淫酗者，亦酒也。”因为酒的特性，酒既能使人精神兴奋，也带来了各种问题。因此，酒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多重性，被人们称为“欢伯”“福水”“狂药”“魔浆”“祸泉”等，这也是博大精深的酒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以分解和认识。

在英文当中，Alcohol 原指酒精，现在也用来泛指任何含有酒精的能醉人的饮料，像葡萄酒、啤酒、烧酒等。Drink 泛指包括酒的各种饮料，也可特指酒。Liquor 和 Spirit (s)，均指非发酵的烈酒或蒸馏酒，相当于汉语的“烧酒”“白酒”“白干”。Wine 源自拉丁语 Vinum (葡萄)，一般指发酵过的葡萄酒等果酒。汉语的“白酒”其实是烧酒，不能译为 White Wine，而应译 Liquor 或 Spirit。

中西方在酒文化上有诸多相同也有相异之处。无论在东方和西方，人们总是要面对人生和生活的各种状态，如忙碌和无奈、生命的短暂和无常等。但只有在饮酒之后，很多情感才得以表达，多种情绪才得以解脱。这种人生观在东西方的酒文化中都有所体现。当烦恼不断、忧愁缠身时，人们习惯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借酒浇愁”，如李白“举杯销愁愁更愁”。杜甫在《落日》里也有类似的诗句：“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愁。”英语也有借酒浇愁、借酒解愁的习语，如 drink one's sorrows / troubles 等。中西酒文化在表达上的差异，也反映了中西酒文化资源的巨大差异。

中国人饮酒最为主要的是白酒，因此，可以说，我们现今讨论的中国酒文化主要就是白酒文化，酒文化资源也主要是白酒文化资源。白酒具有历史悠久、工艺成熟等特点，它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蒸馏酒。盛酒器也是酒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盛酒器较为受到重视，其主要以瓷器、青铜器和漆器形态出现，通常造型优美、装饰形式众多，这在各种出土文物中可以发现。而且中国古代酒器大多是成套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这是酒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酒之时的礼仪也是酒文化资源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中国人在饮酒时非常重视与人交往，即重视饮酒的对象，要的是饮酒的气氛。饮酒礼仪体现了对饮酒人的尊重，这种礼仪可以体现在饮酒的座次上，主人与客人都有固定的座位、固定的饮酒秩序。在有些地方，敬酒时主人开始敬，主人不敬完，别人是没有资格敬的，如果乱了次序是要受罚的。而敬酒的对象一定是从最尊贵的客人开始，敬酒时酒杯要满，表示对被敬酒人的尊重。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要主动敬酒，而且讲究的是“先干为敬”。酒对很多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工具，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山间村夫都是如此，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知心而寓之酒也，人们依靠饮酒而追求酒之外的东西。因此，中国有很多与此相关的典故，“青梅煮酒”是为了论证谁是英雄；“将进酒，杯莫停”，为的是“与尔同销万古愁”；竹林里狂歌的七贤，为的是借酒避难。不论古今，酒都可以作为中国人的一种社交手段，所以中国的酒文化与酒文化资源中很多不是对于酒本身进行科学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品评，而是饮酒及饮酒之后所带来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人喜欢饮酒的重要原因。

西方在上述方面就与中国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也就造成中西酒文化资源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西方的酒文化与西方文化发源地有着很大的关系。西方文明摇篮的希腊地处巴尔干半岛，三面环海，境内遍布群山和岛屿，土壤相对贫瘠，属于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而更喜欢沙砾土壤的葡萄，以其耐旱性和对地中海式气候的适应性而在希腊广泛种植，因此葡萄酒满足了西方人对酒类的需求。西方的饮酒器与中国也有很大的差距，与酒类本身以及与文化、科技有着很大关系，西方的饮酒器大多是玻璃制品，讲究透明，目的是在于能够观察出酒的档次高低。西方酒器轻巧方便，现已被大多数中国家庭所接受。西方人注重酒的品类多样，喝酒的器具也不一样。所以他们有葡萄酒杯、白酒杯、红酒杯、白兰地酒杯等。西方人饮酒要的是充分享受酒的美味。饮用葡萄酒的礼仪，则反映出对酒的尊重。品鉴葡萄酒要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调动各种感官享受美酒。在品饮顺序上，讲究先喝白葡萄酒后喝红葡萄酒、先品较淡的酒再品浓郁的酒、先饮年份较短的酒再饮年份较长的酒，按照味觉规律的变化，逐渐深入地享受酒中风味的变化。而对葡萄酒器的选择，也是围绕着如何让品饮者充分享受葡萄酒。饮酒的目的往往很简单，为了欣赏酒而饮酒，为了享受美酒而饮酒。当然，在西方，葡萄酒也有交际的功能，但人们更多的是追求如何尽情地享受美酒的味道。酒文化的不同也造成中西酒文化资源的不同。这种差异要求我们在进行中国酒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时注意到其不同性。

中国酒文化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酒礼，酒礼就是人们喝酒的行为规范、规矩、礼节行为等，中国人在此方面较为讲究，有着一整套的礼仪和规定。柳诒徵认为：“古代初无尊卑，由种谷作酒之后，始以饮食之礼而分尊卑也。”可见，酒礼由来已久，并且这种酒礼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和行为规范。上层统治者强调酒礼，其目的在于维护统治、保护其特权；文人雅士倡导酒礼则是为了满足其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的需要，他们推崇超俗的境界，追求儒雅的风度；普通百姓强调酒礼主要是从长幼有序的角度去进行规范，是一种孝与尊重的体现。中国人喝酒喝的是感情，所以只要有适当的理由，人人都可劝酒让对方多喝酒，以示友好和诚意。劝酒是中国人好客的一种典型表现，但往往不被西方人理解。西方人也有自己的饮酒礼仪。敬酒一般选择在主菜吃完、甜菜未上之间。敬酒时将杯子高举齐眼，并注视对方，

且最少要喝一口酒，以示敬意，但不一定喝光，也从不劝酒。这就体现了酒文化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

西方酒文化有自身的特殊性，如英语中有关酒文化的一些词语也打上了希腊、罗马神话的烙印，那是汉语无法对应的。这体现在西方的神话当中，例如，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在罗马神话中称巴克斯（Bacchus）。酒被认为是酒神赐予人们的礼物，也是丰收的象征。于是每年12月末都要举行一次新酒节以庆祝丰收，即酒神节（Dionysian 或 Bacchanalia）。酒神信徒们在酒神颂歌的极大鼓舞下，结队游荡，载歌载舞，纵情狂欢，完全坠入忘我之境，人的本性在这里得到最大的释放。酒神节变成了狂欢节，从古罗马、古巴比伦到当今，世界各地几乎都有酒神节的存在。为此，德国哲学家尼采提出了酒神精神，认为希腊人的酒神宴乐含有一种救世节和神话日的意义，这种独特的酒神音乐有别于一般的音乐。只有在希腊人那种抛弃一切束缚、回归原始的状态下，痛极生乐，乐极生悲，美才得以展现，音乐才得以产生，艺术才得以创造。所以相当一部分欧美文化也体现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酒神精神。西方酒文化与艺术的联系，在东西方酒文化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相对来说，中国神话传说中就没有酒神这一说，却有关于酒的发明人一说，最早提到的酿酒人为仪狄和杜康。后来，“杜康”在汉语中被借用指称酒。中国文化中没有酒神这一说，并不等于汉语中没有“酒神”这一词语。汉语中的“酒神”指酒量大的人，与神话无关。该词出自唐朝冯贽的《云仙杂记·酒神》：“酒席之上，九吐而不减其量者为酒神。”同样，中国汉语中的“酒仙”也不是指酒神，而是古时对酷好饮酒的人的美称。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存在，这都是中西酒文化重要的资源，都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加以保护和开发，从而促进其进一步发展。酒文化本身是不断发展的，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酒文化不断发展的各种要素，从而促进酒文化的不断发展，在发展的同时加以开发和保护。

总之，中国酒文化资源有物资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主要涉及诗歌、器具、酒礼酒俗文化风情等。正如上文所述，中国酒文化历史悠久，具有独特的区域发展特点。酒文化对古代及现代人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方面都有所影响，酒文化在人们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及作用，酒文化应吸纳

现代社会认同的符号，作为一种积极的文化导向吸引大众。酒这种用粮食、水果等含淀粉或糖的物质经发酵制成的饮料，一经转化到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各种意识形态中，被人们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模式确定下来，这就叫酒文化。酒这种古老而文明的饮料，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从重要节日、文化娱乐到文学艺术创作、养生保健等各方面，酒在中国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既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又丰富了精神生活。中国人喜欢饮酒的文化传统将会为现代人的生活增添无穷的乐趣。因为四川在酒文化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研究四川酒文化资源管理就更加具有重要价值。这不仅是对四川酒文化发展而言，更是对中国传统酒文化资源保护而言，这也是本书的研究价值所在。

一、酒文化资源及我国酒文化资源现状

《中国历代酒文化发展状况》指出，中国的酒文化可谓源远流长，甲骨文就已有“酒”字，写法是“中间是个酒瓶，两侧曲线表示酒溢出”，这说明酒在甲骨文之前就出现了。这可以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公元前 21 世纪建立的夏王朝各代统治者大都喜欢饮酒，尤其夏朝末代帝王桀，每天只知和宫女、侏儒等喝酒玩乐。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王朝，西周的统治者以商纣王酗酒亡国之事为戒，开始实行酒禁政策。春秋战国时，祭祀、会盟用酒和各阶层人们饮酒的礼仪规格与限制越来越松。两汉施行酒禁政策，虽说汉代统治者一再下令禁酒，但远比不上秦代严格。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对酒产生了特殊的兴趣。虽说时有酒禁，但是总体来看是放纵饮酒的。隋唐的统一，农业的持续发展，为酿酒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唐代各阶层的人均喜欢饮酒。及至宋代，内忧外患，宋人不再具有唐代人的豪情壮志，他们转而在酒色之乡寻求安慰，及时行乐。于是统治者对酒采取暗中鼓励的政策，借以多征收酒税以充实国库，所以宋代酒禁是松弛的，除了官僚士大夫外，市民饮酒之风也兴盛起来，各种酒肆在全国城乡普遍设立。古代人做官不仅仅以科举谋仕，在宦海沉浮中，酒文化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酒文化也广泛地渗透到民俗事项中，如：朋友相聚、红白喜事、乔迁、庆功、过诞辰、造房、打基、占卜、祭天祭祖、重大节日等。可见，酒在中国历史悠久，酒文化内容十分丰富。

酿酒文化正是体现了中国酒文化的悠久历史，上古时代酿酒的方法非常简单，仅用桑叶包饭发酵而成。夏代，我国酿酒技术已经有了一定发展。商代，酿酒业颇为发达，已开始使用酒曲酿酒。周朝，已有酿酒的专门部门和管理人员，并对酿酒工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这说明我国很早就有了发达的酿酒业。南北朝时，开始有“酒”这一名称。唐宋时期，名酒种类不断增多，如曲沃、珍珠红等，酿酒业已十分兴盛。周代酿酒工艺比商代完备，酒的种类也有所增加，《礼记》中就记载有醴酒、玄酒、清酌、澄酒、旧泽等多种酒类。在河北开平一座战国时中山国王的墓中，人们发现了两只精美的铜酒壶，里面贮存的两种古酒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陈酿美酒。西汉承秦末大乱之后，统治者减轻劳役赋税、与民休养生息，促进了农业生产，也活跃了工商业。天下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酒的消费量相当可观。为了防止私人垄断，也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汉代对酒实行专卖。汉朝时人们称稻米酒为上等、稷米酒为中等、黍米酒为下等。武帝时东方朔好饮酒，他把喜爱的枣酒称作仙藏酒，还有桐到酒、肋酒、恬酒、柏酒、桂酒、菊花酒、百未旨酒（一名兰生）、椒酒、斋中酒、听事酒、香酒、甘醴、甘拔等。我国的欧亚种葡萄（即在全世界广为种植的葡萄种）是在汉武帝建元年间，汉使张骞出使西域时（公元前138—公元前119年）从大宛带回来的。在引进葡萄的同时，还招来了酿酒艺人。据《太平御览》，汉武帝时期，“离宫别观傍尽种蒲萄”，可见汉武帝对此事的重视，并且当时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葡萄从西域引入后，先至新疆，经甘肃河西走廊至陕西西安，其后传至华北、东北及其他地区。东汉末期，曹操发现家乡已故县令的家酿法（九酝春酒法）新颖独特，所酿的酒醇厚无比，将此方献给汉献帝。这个方法是酿酒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发酵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补料发酵法。这种方法，现在称“喂饭法”，在发酵工程上归为“补料发酵法”。补料发酵法后来成为我国黄酒酿造的最主要的加料方法。三国时期，各地纷纷出现一些禁酒的政策。但酒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消费品，这些禁酒措施并未能阻止酒文化的继续传播。相反，三国期间各国好酒之人比比皆是，其言行更为我国的酒文化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同时，酒也被普遍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魏晋之际，司马氏和曹氏的夺权斗争十分激烈、残酷，氏族中有很多

人为了回避矛盾尖锐的现实，往往纵酒佯狂。

据《晋书》所载：有一位山阴人孔群“性嗜酒，……尝与亲友书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曲蘖事。”一年收了700石糯米，还不够他做酒之用。这自然是比较突出的例子，酒的流行可见一斑。东晋时，穆帝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与名士谢安、孙绰等在会稽山阴兰亭举行“曲水流觞”的盛会，乘着酒兴写下了《兰亭集序》，可以说是酒文化中熠熠生辉的一页。到了南北朝时，酒名已不再仅是区分不同酒类品种的符号，开始比较讲求艺术效果，并注入了美的想象，广告色彩也日渐浓厚。当时酒的名字有金浆（即蔗酒）、千里醉、骑蟹酒、白坠春酒、缥绞酒、桃花酒（亦称美人酒，据说喝了这种酒可“除百病、好容色”）、梨花春、驻颜酒、榴花酒、巴乡清、桑落酒等，十分悦耳。唐代时酒与文艺紧密联系，这种现象使唐代成为中国酒文化发展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李白有酒诗百篇”，许多与酒相关的名句都是出自这一时期。“酒中八仙”之首的贺知章晚年从长安回到故乡，寓居“鉴湖一曲”，饮酒作诗自语。张乔《越中赠别》一首有句云：“东越相逢几醉眠，满楼明月镜湖边。”与知己畅饮绍兴美酒，欣赏鉴湖月色，又是多么令人惬意的赏心乐事。宋代葡萄酒发展的情况可以从苏东坡、陆游等人的作品中看出来。苏东坡的《谢张太原送蒲桃》写出了当时的世态。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多次遭贬。在不得意时，很多故旧亲朋都不上门了，甚至连音讯都没有。只有太原的张县令，不改初衷，每年都派专人送葡萄来。从诗中，我们还知道，在宋代，太原仍然是葡萄的重要产地。元代，《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记载：元朝的酒类有马奶酒、葡萄酒、米酒和药酒，据估计都是低度饮品。马奶酒又被称为“忽迷思”，最好的“忽迷思”需经过数次发酵提纯，使马奶在皮袋中变成甘美的酒类饮料，这种酒只有大汗宫中才有。

元朝灭南宋后，宋朝君臣来到草原，元世祖忽必烈设宴，“第四排宴广寒，葡萄酒醪色如丹”。米酒是元朝北方农区的佳酿，据《马可·波罗游记》描述：“没有什么比它更令人心满意足的了。温热之后，比其他任何酒类都更容易使人沉醉。”另据意大利学者研究：马可·波罗曾把中国的酒方带回欧洲，现今的“杜松子”酒，其方就记载于元代《世医得效方》中，当时被欧洲人称为“健酒”。元朝还盛产一种粮食酒，蒙古语称其为“答刺酥”，该词还常

被元杂剧使用，如“去买一瓶打刺酥，吃着耍”。元朝时期美酒种类繁多，这必然要求酒具与之匹配，当时酒具有酒局、酒海、杯、盏、玉壶春瓶等。元大都（今北京）就出土有玉酒海，为元朝宫廷用具。

明朝是酿酒业大发展的时期，酒的品种、产量都大大超过前朝。明朝虽也有过酒禁，但大致上是放任私酿私卖的，政府直接向酿酒户、酒铺征税。由于酿酒的普遍，此时不再设专门管酒务的机构，酒税并入商税。据《明史·杂货志》记载，酒就按“凡商税，三十而取一”的标准征收。这样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各类酒的发展。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准民自设酒肆，正统七年（1442年）改前代酒课为地方税，以后又采取方便酒商贸易、减轻酒税的措施，因此酒的交流加快，徐渭在《兰亭次韵》一诗中无限感慨地说：“春来无处不酒家”，可见当时的酒店之多。这期间，黄酒的花色品种有新的增加。有用绿豆酿制的豆酒，还有黄地酒、鲫鱼酒等。明万历年间《绍兴府志》：“府城酿者甚多，而豆酒特佳。京师盛行，近省地每多用之。”清代，酒业进一步发展，由于大酿坊的陆续出现，酒的产量逐年增加、销路不断扩大。于是在各酿坊的协商下，品种、规格和包装形式也就统一起来。为了扩大和便利销售，有些酿坊还在外地开设酒店、酒馆和酒庄，经营零售批发业务。早在清乾隆年间，“王宝和”就在上海小东门开设酒店；“高长兴”在杭州、上海开设酒馆；“章东明”除在上海、杭州各处开设酒行外，又在天津侯家后开设“金城明记”酒庄，专营北方的酒类批发业务，并专门供应北京同仁堂药店制药用酒，年销近万坛。酿酒的历史和发展自然带来的是酒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丰富的酒文化资源。

四川是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而且因其靠近青藏高原等中国大多数河流的发源地，其水质之优更是毋庸置疑。“中国白酒金三角”坐拥众多水系：岷江、涪江、沱江、金沙江、赤水河，在这些江河流域，富集酒江湖最负盛名的豪门：舍得、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等，茅台酒也产自赤水河流域。川酒称霸酒江湖，各大豪门都有领袖群雄的深厚功力：五粮液，坐镇酒都宜宾，销量连续16年雄踞酒林首位；泸州老窖，酒城望门，泸香型白酒开山鼻祖，其窖池从1573年延续至今，堪称国窖；沱牌曲酒，射洪老号，首开“生态酿酒”先河，建有全国首座酿酒工业生态园，同门舍得酒近年更是异军突起；剑南春的天益老号，乃酒林规模最大、保存最

为完整、工艺要素最为齐全的活窖遗址群；水井坊，号称天下中国白酒第一坊；古蔺郎酒，酱香典范，天宝洞、地宝洞，乃酒江湖不可世出的藏酒圣地。好酒之人自然为上述观点欢欣鼓舞。但逻辑关系依然是：“清醪之美，始于耒耜。”没有粮食，就没有中国酒。天府之国“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故而“居给人足，以富相尚”。在稻作农业的有力支撑下，四川酒业之风得以蓬勃兴盛。其中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原料品种，例如，成都平原绵竹糯米、大米，以及川南丘陵赤水河流域的米红粱，这是酿造剑南春和茅台酒不可或缺的特殊原料，其他地方是难以出产的。“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诗经》中黄鸟啄食的“粱”，也是泸州老窖的“肉身”——高粱。酒城特产的“泸高粱”，比起其他地方的“粳高粱”，对酿酒生产具有独到的优势。这些都构成了中国丰富的酒文化资源。四川如此丰富的酒文化就形成了丰富的酒文化资源，这些酒文化资源也是四川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础，酒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管理就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二、酒文化资源管理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三大酒系的发源地之一。以固态发酵、固态蒸馏为特征的曲蘖酿造技术是我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第五大发明”，曾经对东南亚各国的酿造技术以及西方的酒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酒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蕴涵而在世界酒文化之林独领风骚，中国酒文化蕴涵丰富、自成体系，具有很大的精神文化价值。酒文化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从古至今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酒在发挥其强大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危害，包括酒后滋事、酒后驾车造成的交通事故等社会问题以及酒依赖、酒精肝、胰腺炎、胎儿酒精综合征等医学问题，而所有这些危害当中以酒依赖最为严重。因此进行酒文化资源的科学管理就十分重要，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系统管理。纵观我国酒文化的历史，酒不仅以物质形态出现，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形态的呈现，它渗透到宗教、风俗、礼仪、军事、政治、文学等各个方面。同时，通过研究中国酒文化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中国酒文化的发展，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因此，可以看出中国酒文化对社

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酒文化资源管理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并可以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发展。

1. 酒文化资源管理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酒文化资源管理有助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有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在酒文化中有一种形式是物质酒文化，所谓的物质酒文化主要体现在酿酒及饮用过程中所涉及的装置、酒具器皿等。伴随着漫长的历史，中国物质酒文化经历了变化的发展历程。为了满足酿酒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在材料、工艺上不断进行创新。劳动人民在考虑酒具的实用功能外，还得考虑它的艺术性、现实性，从材质、造型、花纹图案、诗词等。最早的人工酒杯是陶器、兽角器、竹木器和植物的硬壳器，商周时代出现了青铜爵杯，后来出现了漆杯、金银杯、玉杯；汉代出现了瓷杯，再后来玻璃杯流行；现代还流行着水晶杯、塑料酒杯。在这些不同的材质上，工匠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倾注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制成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酒具酒杯艺术品。在酿酒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与酿酒有关的技术和技艺应用到其他方面，大大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有就是酒文化相关的建筑、窖池等，这些都是酒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科学而有效的管理有助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如旅游产业等。酒文化资源管理应该成为酒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的重点。

2. 酒文化资源管理有重要的政治价值

酒文化又孕育了文化酒，文化酒的日臻成熟，又反过来促进了酒文化继续发展。中国酒文化既是一种社会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从古到今，酒在政治家、军事家们手里，便成了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和武器。三国时的孔融，在《与曹操书》中举出了在历史上上至古帝下至西汉，以酒推动政事的实例；酒能立国兴邦，酒能使为将相者创建勋业，酒能使政治家做出英明的决策，为圣人者亦离不开酒，足见酒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后周节度使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取得并巩固了帝位；还有著名的“对酒当歌”“青梅煮酒”，喝的论的全是政治。这样的例子在我国历史长河中不胜枚举。酒在现代政治、军事中仍有神奇的作用。1935年，红军第三次横渡赤水河时，茅台镇当地人们争相向红军敬献自己的美酒绝酿，帮助战士们疗伤和消除